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批判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文稿选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目 录

- “倒过来”的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张天飞 (1)
- 林彪、“四人帮”的形式主义批判 孙发祥 尹继佐 (4)
- “四人帮”诡辩的几种典型手法 王耀坤 (7)
- 一种假左真右的法西斯社会主义
——大毒草《谈谈党内资产阶级》批判 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 (11)
- 篡改党史是林彪、“四人帮”共同经营的反革命勾当 杨关林 (15)
- 党的白区城市工作不容否定
——揭批“四人帮”伪造《党史》的罪行 上海师大历史系现代史组 (19)
- “帮八股”必须彻底清算 许宝华 邓明以 (24)

“倒过来”的哲学必须彻底批判

张天飞

“四人帮”千方百计阻挠、破坏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妄图扼煞批林整风运动，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就公开跳出来压制群众性的批林运动。人们批判林彪形“左”实右、假左真右，张春桥说：林彪就是极右，说形“左”实右，是美化林彪；人们批判林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无政府主义，张春桥则说：这要批到群众头上去了；人们批判林彪鼓吹精神万能论，张春桥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不能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人帮”保林实际上是保自己。“四人帮”与林彪狼狈为奸早已勾结在一起，干着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共同的反革命策略，也有共同的思想体系。因此，深入批判“四人帮”必须同时批判林彪。

从世界观方法论来说，林彪与“四人帮”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林彪鼓吹的“倒过来”的哲学，则是他们反动世界观的认识论基础。让我们来看看，“倒过来”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货色？

一九六八年八月，林彪在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什么：“从思想形成的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倒过来”的哲学。林彪打着“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的幌子，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把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采取形式主义主观推论的手法，把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说成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的过程。”我们必须揭穿这种诡辩把戏，揭露它的唯心主义实质。

按照林彪说法，一个是“形成思想”的认识过程，另一个是“办事情”的实践过程，这是两个根本不同、互相对立的过程”。这就把实践和认识相割裂，把实践排除在认识之外，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创立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并服务于革命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派认识论，具体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离开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来谈认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五年就批判了这类错误观点，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9页）毛主席也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实践论》）而林彪宣扬的正是这种错误理论。

我们订计划、办事情、做工作，究竟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分歧。唯物主义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离开人们的主观思想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就必然承认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而唯心主义者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因而妄想人们的主观精神可以决定一切，可以不顾客观规律而任意行动。

那么，我们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不是不要革命理论作指导？思想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是不是可以说从主观出发呢？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一切从实际出发，正是要求人们的主观思想符合客观实际，要求人们的行动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革命理论之所以能指导人们的行动取得预期的成功，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

从实际出发和革命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完全一致的，是自觉的能动性。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思想，是空想，是假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的行动是错误的行动，它只能导致实践的失败，是一种主观盲目性。

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这时人们的思想、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其是否正确。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或者说：“主观见之于客观”，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坚持真理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就是坚持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思想必须符合实际。林彪把理论回到实践中去，说成是“形成思想”以外的过程，是主观到客观的过程，不仅把认识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认识过程中一笔勾销，而且否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在他看来，不是实践中呈现的客观现实检验人们的主观认识，而是人们的主观决定客观，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之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还因为理论虽有普遍性的优点，但没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即便是正确的理论，也只是客观事物共同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而不能包罗每一事物的具体特征。而人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是客观现实的具体事物，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为了使反映共性的理论适合于具体情况，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化为路线方针政策，并为群众所掌握，把科学知识化为技术方法工艺等，成为劳动者的技能。毛主席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东西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唯心史观的破产》）

总之，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出发。正如列宁所说：“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个客观世界，因而目的的实现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哲学笔记》第201页）克服这个困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林彪提出“倒过来”的哲学，不是个别论点上的偶然错误，而是整个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暴露。他公开篡改马克思的名言，说什么：“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的力量要用精神来打倒。”这是他的“倒过来”的哲学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大家知道，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是批判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说的，是马克思完成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标志。这句未被引完的名言，唯物而辩证地阐明了物质和精神、革命实践和理论批判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思想理论战线上批判反动思想的意义，但是单靠思想理论批判，既不能推翻旧世界也不能创立新世界。即使要消灭反动的旧思想，也必须铲除产生旧思想的社会物质基础。马克思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马恩全集》第三卷第43页）否认“武器的批判”即革命实践对精神批判的决定性意义，决不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恰好是对林彪倒过来说法的批判。林彪这一倒过来的说法，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变成了唯心主义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更不否认先进阶级正确思想的伟大作用，马克思上述名言的后半句便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恩全集》第一卷第460页）但是林彪也加以无耻的篡改，说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超过物质的力量。思想是能够起这样的作用的。”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斗争，马克思非常明确而肯定地说：“物质力量当然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思想理论在改造世界中的伟大作用，根本不在于它可以代替或超过物质的力量，而在于它为群众掌握以后，可以转化为伟大的物质力量，群众拥有的物质力量才是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辛辣地讽刺那些相信思想力量可以代

替物质力量的人说：“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弃这个观念，比方说宣布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马克思全集》第三卷第16页）企图用思想力量取代物质力量，借助思想改造世界征服自然，只能是空想，只能是神话和童话，而决不是现实。当然林彪并不是在这里讲神话，而是在讲现实的政治和哲学问题，他是在宣传唯心主义。

从“倒过来”的哲学到“代替论”、“超过论”，贯穿着一条黑线，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认为主观可以决定客观，思想可以决定一切，精神可以改变一切。对于这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张春桥竭力为它辩护，说“精神万能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既是万能，何来条件？所以他说的“一定场合，一定时间”，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四人帮”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基本原理颠倒过来，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张春桥还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颠倒过来，抛出“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他们甚至不顾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把工厂不生产，农业颗粒无收，学生不读书，统统称为“革命路线的胜利”。总之，他们把一切都倒过来了。

林彪、“四人帮”如此声嘶力竭地鼓吹“倒过来”的哲学，其险恶用心就在于从根本上破坏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用林彪自己的话来说，“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抓舆论，又抓枪杆子，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林彪这番话，是他鼓吹“倒过来”哲学罪恶目的的自白。

林彪还鼓吹过：“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对于这句十分拗口而使人费解的话所包含的反革命实质，“四人帮”心领神会，绝口叫好，并加以发展推广，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来个全盘颠倒。他们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污蔑为“旧政府”，要“普遍夺权”，把人民的刀把子公安战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彻底砸烂”；把我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各领域，说成是“封资修的黑线专政”；把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说成是“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真正解决”、“严重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甚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都是“给别人作嫁衣裳”；我们的党和党的干部则被“四人帮”百般丑化，说什么“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变成了走资派”，“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必然规律”。一句话，他们把我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现状，来了个彻底的颠倒。很明显，这是为他们搞“改朝换代”，另立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的反革命勾当服务的。

林彪“四人帮”之所以鼓吹“倒过来”的哲学，信奉“精神万能论”，是因为他们同中外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不仅需要精神万能论来欺骗别人，也需要用它来欺骗自己。林彪在《571工程纪要》中，竭力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希特勒信奉的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和中国封建唯心主义相结合的“行的哲学”，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都是妄图用他们的主观意志扭转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所得到的却是彻底灭亡的下场。

林彪早已自我爆炸，“四人帮”亦已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但他们鼓吹的“倒过来”的哲学，流毒甚广，危害极大，我们决不能低估。多年来在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毒雾笼罩下，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说大话，放空炮，夸夸其谈，主观武断，习以为常，而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反被看作犯了弥天大罪。现在虽听不见有人公开宣传“倒过来”的哲学这类反动理论了，但是，当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从新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拨乱反正提出某项重大方针政策的时候，这种反动理论的余毒就会突然冒出头来，成为一股阻力，干扰着华主席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可见，批判“倒过来”的哲学，决非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任务。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作战。

林彪、“四人帮”的形式主义批判

孙友群 尹锡法

形式主义，是林彪、“四人帮”反动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方法论的一种表现。是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打着反复辟旗号搞复辟的工具；也是他们大搞迷信盲从的愚民政策，大搞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两面派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建立封建的、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散布的形式主义流毒，既深且广，它腐蚀着人们的思想，败坏着传统的作风，危害着革命的工作，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障碍。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联系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批他们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批判形式主义是一个必要的课题。

形式主义，往往是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我国汉朝时曾流行过的谶纬神学，就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神学唯心主义，它利用迷信和盲从来欺骗、奴役人民，刘秀起家，当皇帝，就借用了它。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神学唯心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用死扣教条、玩弄概念、烦琐推理来论证所谓的“至高无上的神学信条”和“不可更易的神定秩序”，宣称“上帝是把理性交给信仰使唤的”。

形式主义，也往往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用来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党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虽然有“左”的，有右的，但搞形式主义，都有共同性。王明机会主义表现的就很突出，他搞“左”倾时，什么“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两个拳头打敌人”，“武装夺取中心城市”，“飞行集会”啦等等。搞右倾时，什么“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等，给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这是大家共知的。

林彪、“四人帮”搞的形式主义，就是从中国封建王朝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那里学来的，他们同王明机会主义有很深的渊源。但他们并没有满足于继承这般家伙的衣钵，而是大大向前发展了，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1、他们神化领袖，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烟幕下树自己。革命人民对林彪、“四人帮”这一恶毒阴谋是记忆犹新的。他们装成对领袖和导师最忠诚、最紧跟、最高举的样子，把领袖说成是“天才”，“先哲”，“完人”，而且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因此要“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要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三忠于，四无限，请宝书，请宝象，表忠，请罪……等活动。

这是些什么货色呢？

搞“天才”论，这是与马列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那里有什么“天才”呢？没有实践，没有千百万群众的生产、革命、科研实践，连起码的认识都谈不上。人的头脑只是个加工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把什么“几百年，几千年出一个”的“发现”，同几千年来文明史一对照，就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无非是要标榜“发现天才的人比天才更伟大”罢了。

从来的领袖人物，就不是谁树的，而是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从来也没有什么绝对权威，绝对总是寓于相对之中的，没有什么脱离相对的绝对。搞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无非是为了树他们自己，树什么“三大助手”，“春桥思想”，“江青精神”，“文元道路”的勾当。他们口头喊“万寿无疆”，而心中要的是跟在后面的那个“永远健康”！

至于那些为神化领袖而搞的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三忠于、四无限、请

空书、请宝像、表忠、请罪等等，骨子里完全是仿效中世纪封建时代那一套皈依上帝的宗教仪式，只不过蒙上一层“现代化”的面纱。

2 他们鼓吹唯心主义的“顶峰”论，“照办”论，提倡迷信盲从、蒙昧主义。林彪、“四人帮”极力鼓吹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顶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人们甩语录，念“老三篇”，背警句，还说什么“句句都是纲”，要“事事高举”，“步步紧跟”，“句句照办”。岂止是一般的照办，还要“闻风而动”，“不过夜”，“不走样”，乃至“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装的多么笃信，多么虔诚啊！

你要思索思索、领会领会、理解理解吗？那可不行，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必须要“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人们：世界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实践是发展的，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那里有什么“顶峰”呢？既然是“顶峰”，不就是到顶了吗？不就是“终极真理”了吗？不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僵死的，无生命力的，被窒息了的东西吗？那些叫“顶峰”叫的最响的家伙，不就是一个个自封为什么“第四个里程碑”，“第五个里程碑”的吗？按照他们的习惯用语，岂不是还有“顶峰的顶峰”吗？

人们的社会实践是作为过程存在、展开的。事物的发展有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过程，不论什么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认识事物的，因此也就不能不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也就是主客观方面的局限性。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说话写文章，哪里有什么“句句是真理”的？如果说“句句是真理”，不就是说有什么“圣人”可以超脱历史的、主客观的局限了吗？这不就是说有什么人的话是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吗？

至于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假的，君不见，说这种话的人自己不就是一句也不听，半句也不听吗？既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顶峰”，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所谓的“照办”论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愚民政策，又是什么呢？

3、他们肢解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形式主义来窒息它、代替它。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的胡说：马列的著作是外国的，离我们很远，既难读，又难懂，有的已经过时，因此，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主席的书。据说这是他们“发现”的一条“捷径”，是什么“一本万利”的事情。接着他们就摆出一付“理论权威”的架势，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一本语录，几十条警句和“老三篇”。不管什么时间、地点，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问题，只要念几段语录，背几条警句，读一读“老三篇”，好象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似的。一时间，拿语录，写语录，贴语录、背语录“对号入座”，直至打语录仗，成了时髦的东西，谁不这么做，轻则受到指责，重则扣帽子，打棍子。

他们这样搞的目的，就是要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还不够，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舍弃它的历史条件，舍弃它的针对性，将它们抽象化，形式化；还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不顾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别有用心的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断句取义；更恶毒的是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对原著进行篡改，歪曲原著的意思，直至把原著中没有的东西硬塞进去，用他们的屁话冒充原著，鱼目混珠，借以骗人、吓人、整人。

综上所述，无论是搞“天才”论，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无论是鼓吹“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照办”论；无论是肢解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偷运他们的私货，都是在搞以迷信、盲从、蒙昧、愚民为特征的形式主义，以达到他们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复辟封建的、法西斯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而所有这一切阴谋，都是以极“左”的形式伪装着的，揭开这层面纱，就显露出其极右的本质，显露出其狰狞的面目。

党史上这两个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危害最深的反党集团，搞这么一套假左真右，以迷信

盲从、蒙昧主义为特征的形式主义货色，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
林彪、“四人帮”继承了中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僵死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衣钵，又继承了现代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机会主义的衣钵，这方面的问题，为了节省篇幅，就不赘述了。

前面还提到，林彪、“四人帮”还有所发展，并且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登假左之峰，造真右之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是一伙反动派，并且不是一般的反动派，他们的主要骨干是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的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流氓阿飞分子，他们的社会基础，就是被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残渣余孽。

一小撮反革命派，复辟派，在中国经过了廿多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廿多年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党内经历了九次路线斗争之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在共产党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情况下，要想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推波助澜、混水摸鱼，妄想打倒一大批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非得要把自己特别打扮一番不可，就非得要在自己的鬼脸上涂上厚厚的一层油彩不可，就非得要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不可。不如此，他们就骗不了人，不如此，他们就捞不到权，不如此，他们的阴谋就得不到掩盖而容易被戳穿，于是乎，什么“助手”、“旗手”、“理论权威”、“金棍子”等等就“应运而生”了，什么“坚决左倾高姿态”，“手不离语录、言不离毛主席”，“凡是左三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等就泛滥起来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蒙蔽和欺骗了相当多的人。

林彪、“四人帮”的历史的阶级的根源，使他们的阴谋活动除了带有假左真右的欺骗性以外，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法西斯性。这些大阴谋家和野心家，有的要建立自家父子的王朝，有的要当女皇，有的以老头子自居，他们搞封建的君臣父子那一套，搞邦会行会那一套，搞迷信盲从那一套。除了这一套以外，他们还搞了法西斯的一套，在他们那里，封建的和法西斯的东西，并不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过程的演变，怀疑、识破、抵制、反抗他们的人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广泛深刻，他们的封建性，特别是法西斯性也就越强化，以至达到连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都为之逊色的地步。但是，历史的逻辑是：任何事物都在一定的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了去。林彪、“四人帮”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终于被人民所打倒，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辩证法要求对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和分析。”（《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在形式主义批判中还有一个问题要说几句的是，为什么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这种以盲从的蒙昧主义为基础的形式主义，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蒙蔽相当多的人呢？（当然这“蒙蔽”是他们借着法西斯式的专制、棍棒和帽子来实现的，即使有意见，大多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应当说，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发生的，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我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家。所以，封建意识在广大群众中间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虽然，一九四九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家。所以，封建意识在广大群众中间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虽然，一九四九年，这一历史大变动，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这既深又广的影响是不能一下子肃清的。何况，意识形态有它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它一经形成，就有一种巨大的惰性力量（或者叫做保守性）。林彪、“四人帮”这套形式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保守性；而他们大搞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等，则更加重了这种封建意识的泛滥和“回潮”。

“四人帮”诡辩的几种典型手法

王 强 著

“四人帮”在篡党夺权的活动中，同林彪反党集团一样，都是用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主席。为此，他们不仅要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必然要践踏逻辑，玩弄诡辩。“四人帮”违反逻辑，玩弄诡辩的事例是大量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下面着重剖析他们诡辩的几种典型手法。

一、所谓“宁要、不要”论

所谓“宁要不要”论，也就是宁“左”勿右论，实质上是假左真右。“宁要不要”论是“四人帮”喋喋不休，公然兜售的荒谬逻辑，货色颇多，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资本主义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穷国，不要资本主义富国”、“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等等。

“宁要不要”论贩卖的是假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它是以社会主义和高速度，社会主义和富国，劳动者和文化两者不可兼得为前提的，把事物都看作是彼此排斥互不相容的，是绝对地对立的，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

从形式逻辑来看，上述各种表达式都是选言直言推理的省略式，“宁要不要”论的逻辑错误及其实质在于：

第一，选言肢不穷尽，违背了选言推理的规则，即大前提列举的选言肢应当是穷尽了对象的全部属性的规则。比如说关于速度问题，按照逻辑组合，在大前提中应有四个选言肢：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高速度，或者是社会主义的低速度，或者是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或者是资本主义的低速度。在四个选言肢中加以选择，我们要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高速度”——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培养选拔人才方面，按照逻辑组合，在大前提中也应有四个选言肢：或者是有文化的劳动者，或者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或者是有文化的剥削者，或者是没有文化的剥削者。在四个选言肢中加以选择，我们要的当然是“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四人帮”故意把“社会主义的高速度”、“资本主义的低速度”两种可能性排斥在外；把“有文化的劳动者”、“没有文化的剥削者”两种可能性排斥在外，使得大前提的选言肢不穷尽，违反了规则，破坏了逻辑。玩弄这种手法的目的，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剔除在外，以篡改歪曲党的路线和方针。

第二：任意的把推理换成了一个二难推理式的诡辩，便于他们打棍子。由于选言肢不穷尽，只留下两个选言肢来选择，这样，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二难推理式的诡辩，即如果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低速度；要是高速度，那就是资本主义。使人进退两难，做出任何一个抉择都不利的，而他们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反对，任意地扣帽子。

第三、打出极“左”的旗号，得出极右结论。二难推理本来是使人进退两难处于窘境的，然而“四人帮”竟大言不惭，公开提出“宁要不要”论，公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等等。仿佛以此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虔诚信奉、坚贞不渝。其实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彻底否定，是“左”得出奇，右得要命。高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更是有其规律性，那决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假社会主义了。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运动中
的“左派”幼稚病时曾指出：“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产生出来，变得深刻，
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志，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四人帮”正是十分卖力地在
干着这种荒唐愚蠢的事，真是幼稚得可爱，好笑得可怜。

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实际上也就是“四人帮”的“宁要不要”论，就是“宁
要空头政治，不要政治落实到业务上”。林彪还说过：“只要人的思想好了，即使没有发射
装置，也能用脑袋把鱼雷顶出去”。这不就是说“宁要人的思想好，不要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吗？由此可见，林彪和“四人帮”在政治思想体系上是一丘之貉，在违反逻辑所玩弄的手法上
也是一脉相承。

二、所谓“等同”论

所谓“等同”论，说得明确一点，就是任意等同论，即把两个不同的概念，任意划上等号，
主观地加以等同起来。

“等同”论是违背同一律的。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遵守同一律，正确地运用概
念，是逻辑思维最基本的条件。同一律要求，在同一议论过程中，对于同一对象的思想都应保
持其同一性和确定性。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而“等同”论，将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若
用公式表述，则是：B就是A。是直接违背同一律的，破坏了正确逻辑思维的起码条件。

“等同”论否认对事物作具体分析，否认事物之间的区别，抹煞事物之间的界限，把不同
的事物任意加以混淆，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逻辑上把不相称的概念加以等同，就是偷换概念，
在政治上也就导致无限上纲，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等同论”的表现之一，是把交叉关系的概念当成重合关系的概念。“四人帮”往往把内
涵不同而外延部分交叉的概念变成重合关系的概念，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所谓“老干部等于民
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动公式，把三个不同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拼凑的反革
命政治纲领，不仅内容十分反动，在逻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四人帮”还胡说“折中主义就
是修正主义”。他们为了攻击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先把全面分析的辩证法偷换成折中主
义，然后又把折中主义与修正主义等同起来。其实，折中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
两个概念，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毛主席说过，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
义、修正主义。但是，怎么能由此得出结论，把折中主义和修正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呢？

“等同”论的表现之二，是违反下定义的规则。“四人帮”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就是西方
化”，“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自然辩证法”，“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实际上是在给这些
概念下定义，但是却完全违反了定义概念的外延与被定义概念外延必须相等的规则，因此，不
可能明确概念，相反，在概念上制造混乱。现代化，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之分，怎么能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呢？自然辩证法是哲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是各门科学所
具有的各自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是相对于技术应用科学来说的，指的是数理化等基础科学理论。
散布什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是自然辩证法”，是要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应用科学与基础
科学的关系上制造混乱，以便兜售“代替论”这样假左真右的货色。这类定义，在逻辑上，违
反了种加属差、外延相等的定义方法和规则。这样偷换概念，在政治理论上，必然导致篡改正
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于“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这样的定义，纯粹是玩弄文字游戏，更
是无稽之谈。无非是为他们破坏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培养目标提供“基石”，使得他们在
高校中推行的一套货色，似乎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的。

“等同”论的表现之三，是把两个根本不相容的概念等同起来。江青说：“不听我的话，
就是不听党的话”。江青根本不能代表党，更加不能等同于党，这除了反映他的野心外，也暴
露了她逻辑上的荒谬。尤其骇人听闻的，是江青关于“生产力”的“新发明”。江青说：“在

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她把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的生殖力混为一谈，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概念与生理学上的概念等同起来，逻辑上的荒谬，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整顿就是复辟”，“核算牌上墙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以及把“经验”说成“经验主义”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等同”论。

“等同”论的表现是大量的，如：服从组织就是奴隶主义，搞规章制度就是搞管、卡、压，进口必要的技术就是爬行主义，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就是洋奴哲学，发展多种经营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就是福利主义，钻研科学文化就是白专道路，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等等。

林彪关于“有严重错误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等等一类的说法，在理论上是荒谬的，从违反逻辑玩弄诡辩上来看，也就是“四人帮”的“等同”论货色，主观地把外延不相等的概念等同起来。

“等同”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搞大混淆，大颠倒，通过“等同”论，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然而，概念之间的关系终究是客观的反映，这决不是“四人帮”玩弄一套手法，套上“B就是A”这一公式就能改变得了的。

三、所谓“难道”论

“四人帮”是专搞破坏捣乱的祸国殃民帮，他们这也反对，那也指责，自己的主张，又见不得太阳，不敢明说，于是乎，老是用“难道什么什么”，“难道怎么样怎么样”来反问别人，这就是他们的“难道”论。“难道”论是“四人帮”用来偷换论题，以攻为守，兴师问罪的一种手法。

为了说明“难道”论的诡辩性质，先打个比方。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某某是否在上海？”对这个问题，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却反而责问：“难道某某不在中国吗？”或说“难道某某不在地球上吗？”甚至说，“难道某某不存在吗？”这种回避问题，不作正面回答，却把概念无限扩大，加以改变，偷换提出的论题，然后用“难道怎么样怎么样”去反问人家，就是“难道”论的手法所在。这种反问，离题万里，可称为“离题反驳”，也可以叫做“发难责问”或“阴谋问语”。

“四人帮”在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这种手法是经常使用的。

在发展工业的方针上，他们攻击自力更生为主，适当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抓住造船问题，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对毛主席、周总理批准购买一些外国船只的指示是否应该执行，回避回答，对国产远洋轮的质量是否应有严格的要求，也不回答，却利用国产轮远航来攻击责问，张春桥煞有介事地提出：“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允许翻船吗？”把国产轮的制造验收是否要坚持标准的问题，加以扩大改变，偷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允许翻船的问题，既回避问题，又借此攻击别人。这样一来，别人为保证不翻船所作的努力，倒成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一旦船翻了，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也是他们的险恶用心。

关于规章制度问题，他们提出：“难道当时冲击规章制度的都是懒汉吗？”按照他们的混账逻辑，既然冲击的并不都是懒汉，那么冲击就无可非议，冲击完了就算了。他们回避提出自己的主张，却把“冲击的全都是懒汉”强加于人，偷换了论题，再加以反问，搞“难道”论诡辩。

当部分国营农场打算试行半工分半工资制度时，张春桥暗放毒箭，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阴阳怪气地攻击说：“我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用他们的典型语言来说，就是“难道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其实，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根据具体时间、地点、条件来制订国营农场的分配制度，这是正确贯彻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

力的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变得“不灵”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一伙的篡改和歪曲。不同回答工资分配制度应该怎么办，却一下子跳到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上来反问，这也是“难道”论诡辩的表现。

此外，针对科研要走在生产的前面的问题，他们责问：“科研要走在前面，难道马列主义走在后面”？针对“没有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担”，他们责问：“难道先要有文化，变成知识分子才能革命？”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诡辩命题。

林彪在他写的一首诗中，胡说什么“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意思是说：“难道坚定相信马列主义的我会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这是对毛主席批评的反扑，也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他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怀疑星火燎原，这是事实。用什么“坚信马列”这样的虚假前提，用“难道”论这样的手法，也是无法洗刷得了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难道”论的手法上，林彪和“四人帮”也是共同的。

“四人帮”和林彪以为这样一来，错误就全都可以推到别人头上，真理就全都可以捞到自己手里了。经过他们这样的虚张声势，仿佛他们打扮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孔就可以增添几层油彩，更可以迷惑和欺骗人了。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一叨念“难道”论，就可以起到“紧箍咒”的效用，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得牢牢的，把人们的嘴巴堵得死死的，似乎真理也无法穿透出来。其实，这都是枉费心机，结果是，欲盖弥彰，反而暴露了他们的荒谬无理，更加暴露了他们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理论上的明确，逻辑上的严密，这是有力量的表现；回避问题，含糊其词，用“难道”论这样的伎俩来代替回答，这是虚弱的表现。分析一下“难道”论的逻辑错误，可以看出有如下特点：

①对所提问题，不作出判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在逻辑上就是缺乏明确性，是不允许的。他们这样做，既和他们的无知无能有关，也为他们心怀鬼胎，耍弄阴谋的反动本质所决定。

②用责问代替回答。不作回答，却离题万里反问别人，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然而这正是“四人帮”以攻为守，大打出手，给别人打棍子扣帽子所需要的。因为不回答，也就不产生对和错的问题；反问别人，就可以趁机任意攻击。

③在责问中把概念加以变化扩大，以至脱离了原来的议题，实质是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它的表现形式是，虚张声势，动辄“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口气很大，气壮如牛，装出一副马列主义者的样子，实则心亏理亏，胆小如鼠，所以只得求救于歪门邪道。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卑鄙的手法是服从于卑鄙的目的，“四人帮”对逻辑的破坏性是和政治上的反动性紧密相连的。在政治上，他们搞假左真右，把马克思主义说成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说成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他们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搞乱理论，混淆是非，把真理说成谬误，把谬误说成真理；在逻辑上，他们破坏正确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强词夺理，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二、“四人帮”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不仅在思想理论体系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玩弄诡辩手法上也是共同的。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逻辑武器，揭穿他们的诡辩，将有助于进一步揭露他们政治上哲学上的反动实质，暴露他们的虚假面目，把揭批“四人帮”和林彪的斗争深入下去。

一种假左真右的法西斯社会主义

——大毒草《谈谈党内资产阶级》批判

上海市出版局批判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理论组

大毒草《谈谈党内资产阶级》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一九七六年夏天炮制的，原定当年十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排出了校样，由于“四人帮”的垮台，没有来得及出笼。但在这前后，曾用同一个题目，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了五讲，流毒很广。如果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小辞典》是“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帮书，那末，《谈谈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他们全面篡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他们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作。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谈谈党内资产阶级》这本帮书，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恶毒地歪曲、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四人帮”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并进而在中国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制造理论根据的。

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进行批判：

一、丑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一切假社会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考茨基宣扬“自由的人民国家”；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则鼓吹“全民国家”。他们都以右的表现形式，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四人帮”则大谈“阶级斗争”，大谈“继续革命”，以极“左”的表现形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帮书装出坚持辩证法的样子，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的专政“两重性”论。这一谬论，是“四人帮”在大毒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抛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创新”。书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两重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两重性的集中表现。一方面，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另一方面，由于还要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国家又跟旧社会差不多。”

显而易见，“四人帮”的着眼点并不是前面的“一方面”，而是后面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的因素。书中在另一个地方就说得十分露骨了，它说：“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尽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避免，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职能。”好一个“在本质上”！一语道出了真情，什么“两重性”，那是假的，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才是它的真意。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权利论述的无耻篡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都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把这种平等的权利抽象出来，叫作资产阶级权利。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决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在本质上是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

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必须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宪法的第十条中就有明文规定。“迫使人们遵守”的这种“法权规范”，不正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体现吗？哪有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的职能，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至于列宁所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与革命》，译文有校改）！这也是从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保障资产阶级权利，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这个意义上说的，这根本没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职能的意思。

这一本书，就是这样卑劣地篡改马列，把“四人帮”编造的“资产阶级法权”膨胀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病，并进而炮制无产阶级专政“两重性”论，为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制造根据。

它从这种臆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两重性”出发，把剥削阶级专政的所有坏东西，统统硬加在无产阶级专政头上，给无产阶级专政抹黑。书中说：“如果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那末，无产阶级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恶习就是在这个土壤上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气候。”

我们知道，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政权的一种固有习气，官僚主义作风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中出现官僚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

正因为官僚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导师一再告诫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参加实践，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列宁当年针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如何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强调指出“现在问题的全部关键在于要有实践家和实践”（《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毛主席把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提到“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的高度。可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要求，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积习。

这本帮书，就是这样恶毒歪曲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既有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又有剥削阶级的积习，从土壤到气候都是培育“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源，把无产阶级专政简直看成同资产阶级专政一模一样。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借口“党内资产阶级在政权机构中”，而把专政矛头指向一大批党和国家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进而全面颠倒敌我关系，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二、颠倒社会主义社会敌我关系，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四人帮”的所谓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反革命的命题，它从根本上篡改毛主席关于走资派问题的科学论述，篡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这本帮书为了从“理论”上系统“论证”这个谬论，拼凑反动体系，几乎搬出了“四人帮”反动思想武库中所有的破烂武器。

它先是抛出了“阶级变动”论。它对这个问题特地设了一章予以鼓吹。这个谬论在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报刊上虽已宣扬了不少，但象这样把它赤裸裸地直接同“党内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还是少见。书中说：“党内资产阶级的出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资产阶级队伍重新组合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所谓阶级关系的“变化”，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变化”出来了一个“党内资产阶级”。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最根本的变化是，无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由统治阶级转变为被统治阶级。当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发生变化的，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资产阶级则日益削弱直至灭亡。这是就整个阶级而言。就阶级中的分子来说，则无产阶级队伍中包括党内也会有部分不坚定的分子遭受腐蚀而蜕化变质，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其中多数也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但所有这些变化，决不会“变化”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来。何况，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的学说，只有从阶级内部产生政党，决不可能从政党内部产生阶级。所谓“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

这本帮书把“党内资产阶级”从阶级变动中“变”出来以后，为了进一步给它的体系增添“理论”色彩，还兜售资产阶级发展的“三形态”论。书中说什么：“资产阶级是以自由资产阶级的形态首先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当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则转化为垄断资产阶级走向灭亡阶段出现的最后一种形态。”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荒谬绝伦的。因为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如果象苏联那样，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在那里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但这时社会主义已经蜕变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这时形成的资产阶级只能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资产阶级，而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时期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了。

它一面编造“党内资产阶级”的神话，一面又重弹起“四人帮”“全面专政”论的反动滥调。不过，“创造性”还是有的，这就是它把“全面专政”当作“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根本方法。它说：“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方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将越来越多，这是无疑的。但是归根到底，都要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原来，所谓“全面专政”，归根到底就是全面地专“党内资产阶级”的政。帮书中毫不掩饰地说：对于“党内资产阶级”，“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批判、斗争”。甚至杀气腾腾地叫嚷，对待“党内资产阶级”，要“及时地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真是法西斯专政的刀光剑影跃然纸上！

那末，它所要“发动”的“广大群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呢？谁去“斗争”“党内资产阶级”以至“打断他们的脊梁骨”呢？它说，就是那些敢于同来势很凶、潮水般涌来的所谓“修正主义”开顶风船和“对着干”的“反潮流”的“革命派”。具体地说，就是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这就是“四人帮”所依靠的最基本的“革命”动力。

就这样，它打起“阶级变动”、“全面专政”等“左”的旗号，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把革命动力变作“革命”对象，又把革命对象变作“革命”动力，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为“四人帮”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根据。

三、抽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科学社会主义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那种追求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糟粕，把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它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阶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

“四人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歪曲和篡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打着“左”的幌子，“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喊得震天响，但对发展生产力则绝口不提，讳莫如深。不仅如此，他们还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到处打

人，特别是用来作为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武器。

书中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所作的发挥，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春桥曾经说过：“一次革命高潮过后，必定有唯生产力论的思潮抬头。……现在有个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他装出一副坚持“继续革命”的样子，把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出现作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提了出来。帮书按照这种反动思想，进一步地、更加明确地把它同“党内资产阶级”紧紧地扣在一起，把散布所谓“唯生产力论”作为“党内资产阶级活动的”一条重要的“规律”。书中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反党活动所散布的两大烟幕弹。”还说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以唯生产力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

“四人帮”及其帮书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理。他们故意把发展生产力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立起来。书中说：“现代修正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就是“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抽掉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耻篡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包括：镇压反革命；抵抗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则包括：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显而易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四人帮”妄图把迅速发展生产力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强行抹去，这正表明，他们是一伙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正是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光辉体现。书中明目张胆地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张是“唯生产力论的新标本”，是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用‘仙山琼阁’的幻影，妄图把劳动人民重新打入人间地狱”。书中还拚命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所执行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把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正常的对外贸易诬蔑为“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是“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投资场所”，“同我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洋务派张之洞、李鸿章之流有什么两样”等等。颠倒黑白，恶意指伤，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人帮”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这样地切齿痛恨，对迅速发展生产力就是这样地胆战心惊。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逻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民经济繁荣，生产力蓬勃发展，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崩溃，生产力遭受破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炮制的这一套破坏生产力、取消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深深体验过的。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哪里的领导权被“四人帮”及其余党篡夺，哪里的生产就遭到破坏，哪里的资本主义就泛滥起来。“四人帮”及其余党作威作福，花天酒地，过着糜烂透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他们哪管人民的死活，人民喝西北风压根儿与他们无关。此景此情，不是对“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的绝妙讽刺吗？！他们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罢了。他们口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地地道道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四人帮”的这种破坏生产力、取消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因而必须彻底地加以批判。

篡改党史是林彪、“四人帮” 共同经营的反革命勾当

杨关林

运用唯心史观，歪曲历史，篡改历史，欺世盗名，是一切反动阶级惯用的手法。党内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和“四人帮”，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制造反革命舆论，也都把篡改党史作为他们搞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党的九大以前，林彪就指使他的死党篡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以后又炮制了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四人帮”对于林彪大搞篡改党史的反革命勾当不仅心领神会，紧密配合，而且在林彪即将垮台的时候，立即接过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地进行篡改党史的反革命勾当。从一九七一年起，“四人帮”通过他们的御用文人——原市委写作班也炮制了一部所谓《党史讲义》。在这部伪《党史》中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吹捧，大肆宣扬“天才史观”和“英雄史观”，搞了一系列篡改党史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伪造《党史》制造舆论，达到架空毛主席，打击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化自己，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当前，在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这部伪《党史》的同时，必须联系批判林彪篡改党史的反革命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

(一)

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毛主席曾经说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就是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林彪这个反党野心家深知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必须首先篡改党的武装斗争史。“四人帮”的江青就吹捧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亲自指挥的。”为此，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的谎言。例如，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创建革命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这次起义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参加领导的有三万多部队参加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还同党内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而林彪当时从黄埔军校出来不久，在党内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在部队里也不过是一个排长。但是他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为我军的“创造者”，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和污蔑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的朱德同志和贺龙同志，随后在他所炮制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中，就公然篡改历史，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名字全部抹掉，而硬把这个当排长的林彪同周恩来同志并列在一起成为三万多部队起义的领导人。

更加无耻的是，把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朱德同志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的会师，篡改成“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他们通过在江西的那个死党在井冈山纪念馆摆出了一幅所谓“毛主席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以后就在《斗争史》中大肆吹捧林彪，胡说什么：林彪“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开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率领部队“历尽千辛万苦，打到了井冈山，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投入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从此，他“就一直紧跟毛主席”，成为“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战友”。

但是，“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的史实，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当年毛主席在上井冈山后不久，就派过何长工同志去找湖南省委和湖南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朱德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也曾派毛泽覃同志到井冈山与毛主席联系。两军会师后，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革命武装力量更雄厚、更集中了。而且还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朱德同志任军长，陈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下的一支新型的工农革命武装，党的领导力量也加强了。这样，就使当时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所以，两军会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对于我党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有极重要的意义。

而林彪在会师前不过是一个七十三团二营七连的连长，会师后才改任营长，并不是什么带领整个部队的领导。而且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中途还开过小差，硬把这样一个当过逃兵的人，乔装打扮为“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带头人”，这种卑劣的手法，其结果除了给历史留下一个笑柄之外，其他只能是徒劳的。

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会议，林彪为了掩盖他当年对“工农武装割据”右倾悲观的历史，在《斗争史》中却把自己吹捧为对毛主席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领会最深。林彪在江西的死党更是利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大做文章，说林彪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还无中生有的在主席台上加了一个所谓林彪当时坐的位子等等。实际上，林彪上井冈山后，就对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丧失信心，叫嚷“边界物质很困难，敌人力量又大，红军难以维持”，散布“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等右倾悲观论调，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这种右倾悲观思潮，是红军和边界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极大障碍，“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所以，毛主席在边界党的一大上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林彪仍然坚持他的右倾悲观论点，1930年毛主席还写信给林彪，批评他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指出他“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这些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林彪标榜自己对工农武装割据“领会最深”，恰恰是为了掩盖他对工农武装割据“右倾悲观”的丑恶历史。

他们篡改了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历史还不够，又进一步吹捧林彪“在井冈山斗争中实际上就是副统帅”。为了“显示”这个“副统帅”在井冈山斗争中的影响，林彪在江西的死党又在黄洋界保卫战上制造谎言，他们知道黄洋界保卫战是坚持井冈山斗争中的一次著名的战斗，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窃取这次战斗胜利的功劳可以为林彪捞取政治资本。所以，他们大肆宣扬这次战斗是在“林×××的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的胜利”。并且炸毁了刻着毛主席的光辉诗词和朱德同志题字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另外造了一个“火炬亭”。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窜上井冈山，还厚颜无耻地写了“黄洋界”三个大字，做成了匾挂在火炬亭上，为自己扬名。

黄洋界保卫战发生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当时林彪是二十八团一营的营长，随红军大队去湘南执行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错误命令，结果招致了“八月失败”。毛主席同志为了挽救当时的局面，率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去桂东迎还红军大队，这时敌人就派了一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主力远离的时机，一举攻占井冈山。而留守井冈山的只有红军主力一个营和一个团的地方武装，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在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的指挥下，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发动根据地的广大群众配合作战，同时根据毛主席在1928年5月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指挥战斗，经过一天的顽强作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毛主席曾经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这就说明，当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已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逐步形成。而林彪上井冈山还不到五个月，对于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抱着悲观失望的态度，

而形成了他的什么“军事思想”，甚至在自己远在湘南的情况下，还在别的部队中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使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他们这样随心所欲地任意篡改历史，正好暴露了林彪颂扬毛主席是“天才”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天才军事家”的头衔，才是他真正的目的。所以，仅从以上这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篡改中就可看出，林彪为了突出他在武装斗争中的地位，不择手段地把自己打扮成我军的“创建者”，是“一直紧跟”毛主席，坚持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副统帅”和“天才军事家”，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二)

“四人帮”和林彪一样，也是隐藏在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本是一丘之貉，一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推行假左真右的路线，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从合谋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开始，他们出于共同的反革命本性，互相勾结，互相吹捧。林彪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是所谓“我党杰出的女同志”，“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则吹捧林彪是一贯“高举”、“紧跟”，“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大正确的指示”等等，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还为林彪拍了一张装模作样看书学习的大幅彩色照片，继续进行招摇撞骗。张春桥不仅是林彪的黑笔杆子，而且也是他的吹鼓手。1969年张春桥以读《毛选》第五卷为名，向朱永嘉等余党骨干路线交底时，就曾经说过：“这次编《毛选》第五卷，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毛主席给林彪的电报，否则林×××在第五卷中就出不来了。”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张春桥起草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社论中，还有六处提到了林彪的名字，可见，张春桥为了吹捧林彪，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实质上，他们继承了林彪的反革命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四人帮”的伪《党史》中，同样可以看到它和林彪篡改党史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林彪和“四人帮”篡改党史的手法，都是用打着“突出毛主席”的旗号来反对毛主席，诬陷、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事事“高举”，步步“紧跟”，可是在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就十分露骨地提出，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在他炮制的《斗争史》中，对朱德、贺龙、陈毅等同志，更是加上了“军阀主义”、“流氓主义”等等帽子，横加攻击和迫害。同样，在“四人帮”的伪《党史》中还以“突出毛主席”为借口，攻击、污蔑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四人帮”控制的原市委写作组负责人就曾经叫嚣说：“我们党的历史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只有毛主席等几个人，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团结共事，到另一个时期就分道扬镳。写这些人说不清楚，多写主席，其他人尽量少写。”他们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在伪《党史》中，以突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为幌子，攻击南昌起义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污蔑广州起义“路线也是错误的”。他们还采取突出方志敏领导的弋横起义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手法，影射攻击其他许多武装起义的领导人都有“路线错误”。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总是要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在全国人民面前高举武装斗争的红旗，指出了挽救革命继续革命的方向。所以，我们不仅要突出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同时也要充分肯定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还必须看到，毛主席在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不仅注意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十分重视总结其他同志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毛主席不仅肯定了方志敏领导的弋横起义，而且对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闽西起义，贺龙、周逸群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

第一，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等，都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功勋，以及对于当时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至于，在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中，由于没有经验，以及对一条正确路线的认识，不少同志都有一些在实践中反复检验，逐步认识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同那些坚持“城市为中心”，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叫“左”倾机会主义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四人帮”在伪《党史》中，不加分析，不作区别地肆意攻击，污蔑许多次起义是打着突出毛主席的旗号，架空毛主席，打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大阴谋。第二，林彪和“四人帮”都是以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和“英雄史观”作为篡改历史理论的论据。林彪用来招摇撞骗的那篇再版前言中，不是大肆鼓吹“天才”、“顶峰”吗？而这篇黑文的执笔者，恰恰就是“四人帮”中的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林彪反党集团在炮制《两条路线斗争史》时，更是极力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叫嚷什么“写党史要写林彪”，“要放在领袖地位中去讲”，所以，这部《斗争史》实质上就是专为林彪立传的《林氏春秋》。在“四人帮”炮制的伪《党史》中，同样不择手段地吹捧叛徒江青。张春桥曾经公开说：“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是江青“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值得注意的是，伪《党史》中对江青的吹捧，实际上不过是继承和发展了林彪在《斗争史》中对江青的吹捧。例如，在《斗争史》中吹捧江青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杀上文艺战线，亲自领导京剧革命。”而伪《党史》中则说江青“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文艺革命的伟大斗争”等等。还必须指出，吹捧江青领导的文艺革命这个主意又是林彪反党集团中反共分子陈伯达出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共分子陈伯达在“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过程中就提出：要讲一段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由此可见，林彪、《斗争史》和“四人帮”的伪《党史》他们的历史观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林彪和“四人帮”篡改党史的政治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搞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都把自己描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都是打着突出毛主席这个旗号，都是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都是假高举、真反对，假紧跟、真背叛，都是党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所以，从这两个反党集团篡改党史的罪恶活动中，同样可以证明，他们在政治上臭味相投，思想上一脉相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根毒藤上结的两个黑瓜。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终于逃脱不了历史对他们的审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而这本继承了林彪的反革命衣钵，又由“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伪《党史》，也就成了清算林彪、“四人帮”搞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罪证。我们一定要把林彪和“四人帮”篡改党史的罪行连在一起批，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党的白区城市工作不容否定

——揭批“四人帮”伪造《党史》的罪行

上海师大历史系现代史组

本来，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早已被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肯定，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此也有明确的论断。可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利用伪造党史，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伟大历史功绩，为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残酷地打击、诬陷一大批长期从事白区工作的老干部，制造反革命的舆论“根据”。当前，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这些被迫害受打击的老干部得到了平反，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新长征的战斗岗位。但是我们对于“四人帮”全盘否定白区城市工作的种种谬论，必须遵循华主席在十一大上发出的“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的指示，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为党的白区城市工作恢复名誉。

“不写白区城市斗争，是为了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谬论之一。

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党把工作的重心长期放在农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不要城市工作，相反地，必须开展城市工作来配合农村工作。

大家知道，任何事物矛盾着的双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对立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同样，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作为一条完整的道路，它必然包括农村和城市两方面的工作，没有农村工作，就无所谓城市工作，没有城市工作，也就无所谓农村工作。如果否定白区城市工作，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也是行不通的。毛主席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指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以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主席又明确指出：“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因此，要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必须充分肯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我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后目的是为了夺取城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党的工作重心也必须相应变化。例如，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根据当时敌我形势的变化及时指出：“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又如，在中国革命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及时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移到城市，以迎接革命的全国胜利。因此，我党开展的城市工作，正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条道路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春桥胡说：“不写白区城市斗争，是为了强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完全是为了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也是违背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的。几十年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历来都十分重视城市工作，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都曾具体领导过白区城市工作。白区城市工作在支援配合农村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取得全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党在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反动派统治的心脏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动摇了反动派统治的基地，给敌人造成极不稳固的后方，牵制了敌人的力量，有效地配合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恐怖气氛，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这个运动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领导的国统区广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和全国各地的“抗暴”斗争，逐步形成反对蒋介石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给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这些斗争，都和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相呼应、相配合，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为了配合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党还在城市中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这和我党的城市工作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董必武等同志的卓越活动已成为我党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如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和重庆，由周总理等同志的工作，扶植了国民党内部的抗战派，揭露了亲日派的阴谋，打击了投降派的凶焰，使蒋介石顽固派不敢轻易扩大内战，不敢轻易投降日寇，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城市工作还给农村根据地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援。党在城市派遣动员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和领导农村武装，壮大了农村革命力量。党在城市还输送了不少有志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当时设在北平、西安、南京、长沙、桂林、重庆、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都成了输送青年的地下交通站、招待所；在上海，地下党就送了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在城市，党还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开展捐献和筹集物资等活动，给农村根据地以经济上的支援，例如在上海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就是一个在党的支持下，以支援根据地为任务的机构；又如，抗日战争开始后，许多海外华侨开展爱国捐献运动，他们捐献的许多钱款、通讯器材、医药物资等，都是先从香港运到国统区，然后再转送到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的。

由此可见，胜利地开展农村斗争是离不开城市斗争的支援和配合的。

可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伪造的“党史”中一笔抹煞了国统区党领导的城市斗争，对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敬爱的周总理在国统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更是只字不提，其目的就是为了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写城市斗争，就是鼓吹城市中心论”。这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又一个谬论。

什么是城市中心论？城市中心论就是当着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毛主席为我们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时候，而历次“左”倾机会主义头子无视中国的国情，无视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根本形势，仍然顽固坚持城市中心的错误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蛮横要求农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要求幼小的红军去攻占大的和中心的城市，并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梦想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够突破敌人的高压而蓬勃发展，以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城市中心论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理的。我们反对的是“城市中心”，一切服从城市，不是一般的反对城市工作。

我们所进行的城市工作，正如前面分析的，完全是以农村工作为中心，是为了配合、支援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而开展的，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开展的。并且在斗争策略上是按照毛主席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因此，开展城市工作和城市中心论完全是两码事，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历史表明，搞城市中心论是既丢了农村也丢了城市，而遵照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城市斗争则巩固和扩大了农村阵地，也为最后夺取城市打下了基础，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所必然产生的根本不同的结果，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相同点可言。

我们不禁要问，党领导的“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难道是城市中心论吗？在党史上不可以写吗？

还有，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周总理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周总理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并冲破反动派的封锁，亲自拿着报纸沿街叫卖，使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一手掩盖皖南事变真相的阴谋彻底破产。真相被揭露后，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分裂、反对内战、反对倒退的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时停止其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有力地配合解放区军民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打了下去。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也是城市中心论吗？对于我党城市斗争的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和周总理的活动，难道在党史上不可以写吗？

四人帮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着右得不能再右的勾当。把写城市斗争说成就是鼓吹城市中心论，就如同平时人们一谈生产，四人帮就说你是唯生产力论；一谈学文化，四人帮就说你是白专；一说卫星上天，他们就说红旗必然落地等等一样，目的就是以吓人的棍子和帽子，不许人们写城市斗争，以否定党的城市工作，打倒从事白区工作的老干部。

“不要写城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你们的工人、学生，还不是农民把你们解放出来的，有什么好写的！”这又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一个谬论。

农民解放工人？张春桥把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说成是农民解放工人，这完全否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也否定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我国，虽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大多数本身还没有决定过任何问题，而且也不可能决定任何问题”，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的起义和斗争之所以不能推翻封建统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历史证明，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使自己得到彻底解放。

民主革命实质就是农民革命，民主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使农民获得解放的呢？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有许多同志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特别是毛主席在湖南农村的出色工作，在大革命时期，很快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农民革命的暴风骤雨，驱散了沉沉乌云，把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把几千年来在封建统治重压下的广大乡村兜底翻了过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党领导了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毛主席亲自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党的领导下，农村根据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的政权，随着这个政权的逐步扩大，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得到了逐步解决，只有在这时，农民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就是农民解放史，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铁铮铮的历史，张春桥制造“农民解放工人”，只是一种胡扯！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并采取从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中国条件下，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把农村半无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过程。虽然从成份上来看，我们党和军队的同志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但是这部分同志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下，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部分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因此，农民成份占大多数这种情况，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非但不能得出“农民解放工人”的结论，相反，却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中，把农民提高到了无产阶级水平，胜利地领导农民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张春桥

胡说“农民解放工人”，只是妄想以现象掩盖实质，企图从否定工人群众运动入手，达到他进而否定整个城市工作的目的。

“白区工作情况复杂，错误路线统治严重，弄不好就要搞到错误路线上去。”这是张春桥于雄辩，尽管这是张春桥最恶毒的一着，全盘否定党的白区城市工作的又一个谬论。事实胜于雄辩，城市工作的路线问题，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的城市工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张春桥的谬论完全是捏造的。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前，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在发动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界群众运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次举世闻名的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又如汉口、九江的工人阶级收回了租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使整个大革命包括城市工作遭到了失败。

在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我们党的城市工作确实是处于“左”倾路线的统治之下。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革命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盲目地在城市采取进攻形式，使党在城市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百。但是到了遵义会议结束了错误路线在我党的统治以后，城市工作又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35年1月党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是我党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城市工作也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得到了发展。毛主席十分重视城市工作，还亲自为白区城市工作制定了方针政策。一九三九年，毛主席提出城市工作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到一九四〇年毛主席在为党内写的指示中更完整地制定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在毛主席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我们党在城市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直至全国胜利解放前夕，城市工作以其坚实的基础，迎接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

由上可见所谓白区城市工作错误路线统治严重，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时间上看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和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段时期，这一段时间同我党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二十八年的城市工作的历史相比较，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根本不能以此来否定我们党整个城市工作路线的。

尚且，即使是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责任也只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身上，广大从事城市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错误路线是抵制的，他们即使在十分恶劣环境中，仍然机智勇敢地战斗，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监狱里坚贞不屈，在刑场上慷慨就义，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一些幸存下来的同志前赴后继，继续战斗，直到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这一些为人民传颂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四人帮是抹煞不了的。

再说，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因此不仅是城市工作处于错误路线统治之下，就是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也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以后，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不得不离开城市迁入农村，他们继续以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使根据地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中央和红军被迫离开了建设数年的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史事实表明，从整个城市工作的历史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但有一段时间白区城市工作是在错误路线统治之下。“四人帮”的所谓错误路线统治严重，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是为其全盘否定白区城市斗争制造借口。事实就是这么明摆着，白区城市

工作作为党的一项工作，而且几十年就是这么做下来的，你“四人帮”为什么不写呢？即使有错误路线的影响，也应该写，以总结错误路线的教训。张春桥叫嚣：“我历来主张不要写白区城市斗争”，正说明他心中有鬼，说明“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早已是党的叛徒和反革命了。他们深知，有些坚持党的白区斗争的同志是了解他们的丑恶历史的，所以他们妄图采取否定白区工作的反革命手段，来掩盖他们的罪行。然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

万恶的“四人帮”及其余党，不仅在伪造的党史中想一手遮天，抹掉城市工作的伟大功绩，而且他们还散布了什么“白区党组织统统烂掉了”，“白区工作过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汉奸、变节分子”等等澜言，给白区工作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设置了种种“禁区”，他们不仅把从事白区城市工作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统统否定掉了，人民为他们树的碑砸了，革命烈士在九泉之下的英魂遭到了践踏；而且一些幸存的从事白区工作的同志也都被打成了叛徒特务，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他们受到的是数不尽的审查批判，写不完的检查交待，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想到这些，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会怒不可遏。假如国民党反动派给“四人帮”挂上一枚大勋章，的的确确也不是“过奖”！

四人帮及其余党全盘否定白区城市工作的罪恶目的完全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不仅要打掉长期从事根据地武装斗争的老干部，也要打倒领导和从事过白区城市工作的老干部，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然而，不管“四人帮”怎样恶意中伤，城市工作和农村根据地工作的伟大功绩一样，都永远被载入了我党的光辉史册。今天，我们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充分肯定民主革命时期我党白区城市工作的伟大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从事白区城市工作的老干部的重大贡献，彻底推倒“四人帮”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我们的党史成为一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党史，让我们的史学工作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帮八股”必须彻底清算

许宝华 邓明以

文风是时代的产物，一定的文风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的。长期以来，“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疯狂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利用控制的宣传阵地，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炮制的帮书、帮刊、帮文、帮话泛滥成灾，极大地搞乱和毒化了人们的思想。作为“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形式和宣传工具——“帮八股”，也就随之象瘟疫一样到处传播、蔓延开来，严重地糟蹋和破坏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优良文风。

毛主席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为清算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和清算“四人帮”的反动文风“帮八股”，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四人帮”上乱中央，下乱地方，搞得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帮八股是他们一个非常得力的帮凶。因此，在当前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我们一定要在进一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明辨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同时，把“帮八股”文风也来个彻底清算，以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武装党员和人民，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

马克思主义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的真实性表现在语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所决定的文风也就直接地具体地体现在语文表达上。文章讲话都是用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可是“四人帮”却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大搞实用主义，文为帮用。在他们那里，文章、讲话都成了出于反革命需要的主观臆造的产物，是一架“发疯的钢琴”的“乱弹”！剖析其帮话，透视其黑文，的确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们“思想”的反动，看出他们“文风”的腐朽。

“帮八股”的罪状很多，举其要者，揭露并批判如下：

一、断章取义，歪曲篡改

“四人帮”是一伙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也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信条就是“一切都要根据需要”。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断章取义，窃取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借以欺骗吓人。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解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用伪造革命导师教导的卑劣手法，把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私货，贴上革命的标签来加以推销。比如，“四人帮”正是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硬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成所谓“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早在一九六七年，“四人帮”就伙同陈伯达伪造了所谓“全面专政”的语录，以后张春桥又把它硬栽在列宁身上。

“四人帮”也正是“根据需要”，别有用心地歪曲篡改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理论问题的论述的。他们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大搞极“左”，

拼命夸大这个“法权”，弄得到处都是，甚至把工资收入上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声言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以后他们又在所谓“限制”上大作文章，并荒谬地把“级别高”“工资高”作为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断然篡改列宁主义原则，为他们炮制“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要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谬论，制造理论根据。列宁教导我们：“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选集》第二卷337页)“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也正是这样，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篡改、甚至任意伪造的手法，是“帮八股”的一大特征。

二、借古喻今，影射比附

“四人帮”为了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打着古为今用的幌子，大搞借古讽今，影射比附的反革命勾当。

为了进行反党，他们可以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一忽儿用今人去套古人，一忽儿又将古人比附今人；一忽儿让今人说古人的话，一忽儿又让古人说今人的话。为了借古喻今，恶毒攻击周总理，“四人帮”在吕不韦身上大作文章。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吕不韦是个宰相”，“是个折中主义者”。吕不韦的确当过宰相一类的职务，但“折中主义者”的帽子却是“四人帮”强加于他的。同样，“四人帮”为了影射比附，攻击华国锋同志，硬要把“公安部长”的头衔加在孔丘身上。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以后，“四人帮”又抛出黑文《再论孔丘其人》，伪造了“孔丘由司徒代理宰相”的说法，含沙射影，大骂孔丘之流抓生活、抓生产是假，搞复辟、搞倒退是真，用心可谓毒矣！

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什么主义，什么历史人物，在“四人帮”手里都是可以任意揉捏的。但“四人帮”是一小撮见不得人的丑类。他们既想往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脸上抹黑，而又怕被抓住罪恶之手，不敢堂堂正正地行动，于是就妄图依靠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借古讽今、比附影射的腐朽文风，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股黑风被他们刮得如此之猛，在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的。

“四人帮”不仅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以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还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借“评价”历史人物为自己脸上贴金。江青做尽了女皇美梦，竟然得意忘形地自诩为吕后、武则天，说什么：“有人说我是武则天，又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列宁曾经痛斥司徒卢威“玩弄庸俗的类比”，“简直是小丑行为。”(《列宁选集》20卷187页)“四人帮”就是比司徒卢威还要可恶的小丑！

三、形而上学，片面绝对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思想上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毛主席的批评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也是今天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锐利武器。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表现为他们根本违反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规律。他们一讲对立就要否认统一；一讲统一又会否认对立。他们把本来属于辩证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故意割裂开来，并任意夸大这一方，否定另一方，最终又导致对这一方的否定。

在讲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时，“四人帮”胡说一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讲到革命和生产的关係时，一会儿胡说一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一会儿又说“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搞了阶级斗争，“停工停产是伟大胜利”，“颗粒无收也是伟大胜利”，甚至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在讲到红与专的关系时，也是把二者对立

起来，似乎红了就不能专，专了就一定不会红，还胡说什么“知识到手，人被夺走”，把为革命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诬蔑为“走白专道路”。

在“四人帮”的眼里，似乎矛盾着的双方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必须纳入“宁要——不要——宁要——不要”的模式。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反杜林论》19页）

“四人帮”形而上学还表现在大搞片面绝对，他们说好就绝对好，一切皆好；坏就绝对坏，一切皆坏。例如，儒法两家同在一个历史时期，同属地主阶级，但在“四人帮”的模式里，法家就是绝对的好，不管他们对人民做了多少坏事，都必须统统加以肯定；儒家则是绝对的坏，不论他们在历史上曾作出过何种贡献，都要全盘予以否定。形而上学，片面绝对，是“四人帮”反动的政治立场和唯心的思想方法的表现，也是“帮八股”文风的一大特征。

四、以假充真，以假乱真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奉行“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的哲学”。他们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完全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什么都可以伪造，篡改。党史、哲学史、古代史统统可以造假；什么都可以杜撰，今天出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明天又造一个“植棉模范”王大学，后天又来一个什么“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小英雄。反正有用就是真理。“四人帮”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什么典型，需要制造什么事件，就制造什么事件。无可以生有，有可以变无；历史上存在的东西可以随意抹掉，历史上不存在的东西可以主观伪造。他们公然把为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周总理、叶副主席以及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从党史中抹掉，而那个从国民党狗洞里爬出来向蒋介石叩头祝寿的大叛徒江青却被大书特书，历史竟被糟蹋到如此地步！

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假典型、假经验、假报导、假照片充斥在帮报、帮刊上，因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四人帮”要搞反革命复辟，如果不伪装、不欺骗、不说假话，是根本无法过日子的。罗思鼎的头目曾经一语泄露了“四人帮”搞阴谋的诀窍。说什么写文章可以“七真三假”。江青说得更为露骨，“电影片子嘛，就是电影骗子”。“四人帮”造谣手法之多，涉及方面之广，希特勒和戈培尔如果泉下有知，也是不得不甘拜下风的。

列宁曾经嘲笑资本家和资本主义者结成了“说谎同盟”，说他们总是用“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 “四人帮”就是一个由叛徒、特务、骗子、扒手、文痞结成的“说谎同盟”。

五、棍棒飞舞，恶言谩骂

“四人帮”这一小撮政治流氓、反动文痞，手头无真理，身边无群众，他们讲不出任何道理，就只好帽子、棍子随身带，骂人的凶话挂嘴边，以掩饰自己灵魂的空虚和发泄自己对革命的仇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严正地批评过江青“不要开设帽子工厂了”，但“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这一告诫，却置若罔闻。“四人帮”手中的帽子品种之多，口中骂词之凶，在古今中外的反动文风中可以说是创纪录的。

就以对待老干部为例，“四人帮”把革命老干部当作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不仅炮制了“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还攻击老干部“越老越旧，越旧越右，越右越修”，诬蔑老干部“是最大的反革命”，“比反革命还反革命”，提出对他们必须用“重磅炸弹”轰炸，“可以枪毙一批”，甚至扬言要“修改宪法”，制定“枪毙走资派”的“法律”。反动气焰嚣张至极！他们对老干部的刻骨仇恨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四人帮”对知识分子也是百般仇恨，把他们宣判为“剥削者、精神贵族”，胡说他们是“废物”，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蛀虫”，是“叮在修正主义臭肉上的苍蝇”。进而，

干脆把知识分子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排在一起，并“等而下之”，名列第九，斥之为“臭老九”。

在文艺界，他们更是占山为王，今天骂这个作品是“黑线回潮”，明天给那个作品罗织“十大罪状”，今天骂这个作者是“特务”，明天又宣布那个导演是“反革命”；一会儿把这个剧种说成是“靡靡之音”，一会儿又骂那个剧种“不可救药”。有个国画家仅仅由于用墨画国画，即被指为“黑画家”，就是因为江青说过：“黑象征着搞阴谋。”真是专横到了极点，杀人如草不闻声！在“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文艺园地只能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

总之，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人帮”就给谁戴帽子、打棍子。“四人帮”这种既不摆事实，也不讲道理，凶言满口，棍棒飞舞，“无限上纲”的做法，正是他们法西斯作风在文风上的必然表现。鲁迅当年在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时尖锐地指出：“只会‘辱骂’、‘恐吓’甚至‘判决’，……这也是一种八股”。“四人帮”比起它的机会主义前辈来，在“帮八股”中使用“辱骂”、“恐吓”甚至“判决”等手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六、抽象空洞，套话连篇

“四人帮”是一伙惯于在反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大搞修正主义，在反复辟旗号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右派。空话、套话是他们用来把自己装扮成革命者、掩盖其极右面目的一个手法，也是“帮八股”的特征之一。

在“四人帮”的帮文中，充塞着空话和套话，因为他们的帮文，既不需要以事实为基础，也不必受客观实际的检验；他们既不打算提出、也不准备分析和解决问题，但却要装腔作势，自然只好去堆砌抽象空洞的词句。更令人憎恶的是，他们的帮文已形成了一个千篇一律的八股模式，不问有无必要，不管是否恰当，总是开头是引语，末尾喊口号，“革命”的标签贴满身，流行的提法一层又一层，一串又一串，洋洋洒洒，动辄万言，架势十足，似乎“理论”色彩很浓，可是仔细一看，里面却空洞无物。

庞杂臃肿的形式是为了遮盖贫乏空虚的内容。读这类令人头昏目眩的八股文，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们切不可小看帮八股中的这一股，鲁迅说得好：披着极“左”外衣的“空洞的高谈”，乃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你看，“四人帮”不就是专门在转弯抹角、大兜圈子，大讲空话中，在“漂亮”的“革命”词藻装点下，冷不防夹脸一箭吗？讨伐“四人帮”，肃清“帮八股”，必须如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过的：“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

以上我们只是列举了“帮八股”的几条主要罪状，并不能概括“帮八股”的全部罪状和表现。但从上列罪状中，我们即可以看出“帮八股”的共同特点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挂着“革命”的招牌，在“闪光”的语言、漂亮的口号的掩盖下，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帮八股”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带有“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一切特征。“帮八股”的条条罪状，不论是帽子棍子横飞乱舞，还是大搞绝对化、片面性；不论是恶言咒骂、无耻诽谤，还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不论是空喊口号、玩弄词藻，还是歪曲篡改修正马列，哪一条不是在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哪一条不是在搞修正主义和阴谋分裂？“帮八股”这种文风的出现，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的今天，“四人帮”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只得依靠“帮八股”来吓人、骗人。离开了这种反动文风，他们是很难混日子的。

“帮八股”中蕴藏着大量的反革命毒素，它是折磨广大干部、群众的瘟疫，是套在革命人民颈上的精神枷锁。它不仅败坏了我们的文风，也败坏了我们的党风。它使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大受窒息，使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遭到破坏，使资产阶级的专横跋扈、弄虚作假、

“帮八股”危害革命、祸国殃民，它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大敌！

为此，我们对“帮八股”必须以重炮轰击之，彻底揭批它的条条罪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从斗争中恢复和进一步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文风。

“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作的长期斗争中，亲自倡导和培育起来的。早在二十年代，毛主席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发出号召，必须用革命的宣传去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提出革命宣传“内容要丰富一些”，“文字要简短”，“要精辟”。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深刻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同时，批判了他的反动文风，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又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形式“党八股”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全国解放前夕，为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号召我们党所办的报纸应该“尖锐、泼辣、鲜明”，指出“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解放以后，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提出了写文章应该注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要求。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时，毛主席又亲自批转了商业部门两篇好而短的报告，要《人民日报》发表。指出：文章太长谁看？必须改一下。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从整顿文风入手，搞好批林整风，肃清“林毒”。今天，也只有扫除了“四人帮”的文风，才能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

“四人帮”很长一个时期霸占宣传文化阵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破坏之烈，在我党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曾把反科学的反马克思的主观主义方法，称为“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民族的大敌”。“帮八股”也正是这样的“大敌”。它在“四人帮”横行时，固然祸害严重，现在“四人帮”虽倒，但“帮八股”的流毒还很深，比如说假话、说空话、说骂人的脏话；报喜不报忧，爱吹不爱批；不据理服人，不实事求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八股模式等等，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些现象都说明“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已严重地侵入我们的肌体，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损害了我们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要把被“四人帮”糟塌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的伟大号召，彻底扫荡“帮八股”，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为促进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